

金棺

匈一莫拉·弗伦茨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金 棺

[匈牙利]莫拉·弗伦茨 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Móra Ferenc
ARANYKOPORSÓ

本书根据匈牙利柯勒维纳(CORVINA)出版社
出版的英译本(THE GOLD COFFIN, 1964年版)
和德译本(DER GOLDENE SARG, 1963年版)
以及匈牙利文学出版社(SZÉPIRÖDALMI KÖN.
YVKIADÓ)1979年出版的匈牙利文原著译出

金 棺

(匈牙利)莫拉·弗伦茨 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6.25 版页 2 字数 364,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7-5327-0587-7/I·266

定价：14.50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前　　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匈牙利丰富多彩的文苑里，历史小说这株奇葩曾经开放过鲜艳的花朵。涉足这个领域的不少著名作家充分显露了自己的才华，写下蜚声文坛的作品，深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其中佼佼者有格尔多尼·格若(1863—1922)反映十六世纪匈牙利人民抵抗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略和保卫民族独立的边塞勇士英雄业绩的长篇小说《埃格尔之星》；有莫里兹·日格蒙德(1879—1942)描写十七世纪艾勒德伊公国兴衰的长篇巨著《艾勒德伊》(三部曲)；以及莫拉·弗伦茨取材于古罗马历史的长篇小说《金棺》等。这些作品在匈牙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被列入名著之列，为匈牙利现代文学宝库增添了光辉。

—

《金棺》的作者莫拉·弗伦茨(1879—1934)是匈牙利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他出生在匈牙利南部城市塞格德，因家境贫寒，只得依靠亲友的接济和助学金上学。生活的艰辛促使莫拉在学业上更加勤奋。一九〇一年，莫拉毕业于布达佩斯大学文学院，以优异成绩取得了当教师的文凭，随即返归故里，在塞格德中学任教。莫拉从小有志于文艺创作，十四岁开始写诗，陆续发表于当地报纸的文艺副刊上；因此，他在任教一年后，毅然辞去教席，应聘到《塞格德日报》编辑部工作，以记者身份走访了塞格德市郊和绍莫尔州的每一个村落，深入了解贫苦

农民的生活疾苦和他们渴望解决的土地问题；可以说，莫拉熟悉民情，心里装着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这就为他的创作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基础。

早期，莫拉除了写诗，还在报纸上发表报道、杂文和短篇小说，一九〇二年，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金毛羔羊》的问世给他赢得了声誉。莫拉当记者期间，陆续出版了诗集、短篇小说集和青少年文学读物。一九一二年，莫拉升任《塞格德日报》主编，一九一五年加入裴多菲文学研究会，一九一七年兼任塞格德博物馆馆长，从此以后，除了文学创作，考古研究又成了他一生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之，从二十年代起，莫拉就迈出外省地方的狭窄圈子，跻身于全国著名作家的行列。

就政治思想观点而言，莫拉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彻底解体，莫拉曾一度参加匈牙利一九一八年底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的结果使匈牙利最终摆脱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羁绊，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革命初期，莫拉当选塞格德地区革命委员会成员，但他很快就退出，回到创作领域并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考古工作。一九一九年三月间，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和鼓舞下，刚创建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匈牙利这块具有革命传统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莫拉对于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深表同情和支持，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导致真正的社会公正与平等，满足劳动农民渴望获得土地的迫切要求。遗憾的是，匈牙利苏维埃运动经过一百三十三天的斗争，不幸夭折。随后出现以霍尔蒂为首的反动政权。莫拉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表示反对霍尔蒂推行的血腥镇压政策，谴责该政权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推行的对内继续压制工农、对外屈从德国纳粹势

力的反动政策和法西斯措施，始终坚持了一个富于正义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

莫拉来自下层，熟知人民的生活，主张文学创作的使命是把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贫困原因原原本本告诉人民，唤起他们的觉醒。无论是他的新闻报道、杂文，或者博物馆的考古研究工作，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他对人民命运的关切，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莫拉同劳动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同样反映在他的毕生创作中。他的短篇小说都是描写匈牙利南部地区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歌颂他们勤劳、善良、淳朴的品德。除了短篇小说集，莫拉还著有以下著名长篇小说：叙述一位画家及其养女悲惨命运的《一位有四个父亲的姑娘》（1923）；描绘一位教师在霍尔蒂统治时期穷困与不幸遭遇的《汉尼拔的复活》（1924）；细腻地描写广大劳动人民的艰辛生活和在苦难中挣扎的思想情绪，并真实反映农民渴望得到土地的强烈愿望的《麦田之歌》（1927）；最后，在莫拉去世前两年，他完成了驰名欧洲文坛的著名历史小说《金棺》。莫拉于一九三四年不幸病逝，时年五十五岁。

二

《金棺》以公元三、四世纪古罗马帝国后期的历史为背景，围绕着古罗马帝国统治者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日趋衰亡的古罗马多神教同新兴的基督教之间的较量，真实而艺术地再现古罗马帝国后期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广阔场面和总的历史发展趋势。

具体说来，《金棺》的故事内容大致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戴克里先执政后期，围绕着皇位展开的斗争，即戴克里先设法进

一步巩固政权并安排儿子继承皇位，他的女婿伽列里乌斯同他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父子勾结在一起觊觎、阴谋夺取政权，并由此引起的复杂的争斗；其二是戴克里先的儿子昆狄波同伽列里乌斯的女儿提坦妮拉之间的爱情悲剧。在展开描写政治斗争和爱情纠葛的同时又穿插叙述与此有着紧密联系的基督教的传播和基督徒所遭到的残酷迫害。全书的末尾以命运女神授予君士坦丁君主节杖的暗示方式，预示代表新兴力量的基督教战胜没落的罗马多神教，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君士坦丁统一罗马帝国而告终。

当年幅员广大的古罗马帝国是建立在奴隶制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基础上的。古罗马帝国原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国家。它的最高统治者以主神尤皮特的儿子自居，代表神的旨意在人世间行使着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皇室成员也象神的家族一样，他们的尊严和权力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罗马城为中心的古罗马帝国大贵族奴隶主统治着大半个欧洲、北非和小亚细亚的广大地区。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事实上都成了古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奴隶。大贵族奴隶主拥有数量众多的奴隶，可以对他们行使生杀予夺之权。贵族们过着极其奢侈、豪华、腐败和糜烂的生活，他们设置角斗士学校，专门训练角斗士，让角斗士在竞技场上拼死搏斗，以供娱乐。历史上就多次发生过角斗士因不堪忍受奴役而率领奴隶起来反对统治者的大规模起义。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起义运动都先后失败了。

基督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后兴起的。基督教提倡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互助和平等精神，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贫民、奴隶和被征服地区各民族的思想情绪和愿望，因此很得人心，入教的人数也愈来愈多，连统治阶层中的一些人也开始

接受基督教的思想，如在《金棺》里就描写了皇后一度加入过基督教。但是，基督教教义是同古罗马帝国统治者强制实行的奴隶制度和信奉多神教的思想截然相悖的，自然不为统治者所容忍。在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统治者明令禁止人们信仰基督教，乃至残酷迫害、屠杀基督徒的事件。

据史书记载，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以亲卫队长身份被军队推举为皇帝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将庞大的帝国划分为四个区域，由他的共治者和各自的副手分别进行治理，实行了大权独揽的东方式君主制（即多米努斯）。戴克里先在位期间，曾先后整顿税制和币制，颁布限制物价敕令，改革军队建制，让军队驻防边境地区以镇压各民族的反抗，同时也对基督徒进行过多次迫害。戴克里先在位二十一年，逊位后，君士坦丁（306—337）打败了所有对手，统一全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并于313年与共治者李锡尼共同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325年，君士坦丁召开尼西亚会议，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从此，基督教遂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工具。

诚然，历史小说应该而且必须以基本史实为依据，但是，历史小说毕竟不是历史文献，不能要求作者照抄史料，做到人人、事事都有出处。在符合历史发展总趋势和保持历史人物基本面貌的原则下，作者完全可以通过故事情节的虚构和人物性格特征的描写，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来表现作品特定的思想主题。任何一位作者在着手创作历史小说时，都不会单纯地为写历史小说而简单地图解历史，他必定是有感而发的，其中既包括作者本人的历史观，更重要的是阐述他自己对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所持的看法。这就是说，在创作过程中允许作者在大体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艺术概括和富有生活气息的艺术创

造，从而运用艺术的真实来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金棺》这部重要历史小说的情况也正是如此。首先，书中叙述的复杂的政治斗争，实际上体现了维护古罗马帝国上层统治者利益和权势的罗马多神教与代表贫民、奴隶和各民族基本要求及愿望的基督教之间的斗争，也就是日趋衰亡的反动势力同新兴势力之间的搏斗，后者的胜利说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金棺》里出现的人物，除历史上确有其人外，其余显然是作者虚构的，即便是历史人物，在人物性格、内心活动和许多有关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方面，作者也不一定拘泥于具体的史实，而是服从于艺术创作的内在逻辑和表现原则；第三，《金棺》的成书年代，正是德、意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崛起，开始威胁人类文明的时候，作者以借古喻今的手法唤起人民警惕，起来同企图逆转历史车轮的法西斯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书中这方面的意图表现得较为清楚，其含义也是深刻的。

三

前面提到，《金棺》描写的上层统治者之间的斗争是环绕着继承皇位展开的。戴克里先统治的核心是加强皇权和皇位的世袭继承。在戴克里先登上皇帝宝座之前的一百多年间，古罗马帝国的政权更迭频繁，争夺紫袍的斗争异常激烈。连年战争的结果，造就了骄兵悍将，连皇帝都得看他们的脸色行事；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拥立皇帝的大权。在戴克里先之前，走马灯似的换了三十三个皇帝，其中三十个都是被杀害的，还累及眷属，因此当时流行着“要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并不难，难的是维持这个统治”的说法，而在这些许多冒险的皇帝中间，唯有戴克里先做到这一

点。不过他的皇权能否延续下去，他的儿子能否顺利地继承皇位？《金棺》里描写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一中心展开的。

戴克里先本人出身低微，是在残酷的战争中一步步得到提升的，对统治者之间的争权夺利有较深的阅历，可以说他一生就是在相互猜疑的戎马生涯中度过的。他个人颇有见地，意志坚强，冷酷无情，治军严明，这使他有可能战胜其他对手，从混乱中重整古罗马帝国的秩序。戴克里先当皇帝后便有意识地把他的统治制度变成一所训练奴隶的学校，绝对服从他这个主神意志唯一体现者的命令。他把御前会议改为立议，这不但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在思想意识上维护皇帝尊严和加强权力所必不可少的措施；他精心设计的四君主执政制使得“四把出鞘的剑在互相支援，然而同时也确实在相互防范”，事实上戴克里先成了帝国之首脑，其余三个共治者皆听命于他一人；为了确保他的共治者对他的忠诚，戴克里先还巧妙地把他们的子女都留在自己身边当“人质”。

这还不够，戴克里先上台之初，鉴于在他之前许多皇帝均死于非命的严酷事实，担心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子遭到同样的命运，遂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即遵照“神谕”把独生儿子隐匿起来，直至其长大成人，除了他自己，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子本人在内的任何人都不清楚其下落和身份，这样在他儿子年满二十岁时便能顺利地接过紫袍登上皇帝宝座。无可讳言，这道“神谕”是十分严峻的，这样做的结果对他的家庭生活，尤其是给他那位被隐瞒真相的妻子带来了难以形容的精神痛苦。但是，戴克里先之所以坚信“神谕”，显然是考虑到让伽列里乌斯等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就是戴克里先的继承人，对他不生异心，而他在这期间可以从

容地为和平传位给儿子做好充分准备。然而事与愿违，戴克里先的共治者马克西米安父子和伽列里乌斯还是密谋（通过公开联姻的方式）夺取紫袍，果然，伽列里乌斯最后在大祭司塔格斯的帮助下，也采取了笼络人心和收买卫队的手段迫使戴克里先交权。而一直不清楚自己身份的昆狄波为基督殉教，则以悲剧形式宣告戴克里先计划的彻底破产，并在道义上对多神教进行谴责，表明基督教在精神上的胜利。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基督教无疑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奉行皇权神授为最高信条的统治者看来，蛮族的反抗是叛乱，应受到镇压，而信奉基督教则被认为是触犯众神的尊严和帝国的根本利益。特别是经过一百多年的传播，基督教的主张在广大贫民、奴隶和被征服的各民族中间已经深入人心，随着教徒的增加，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成了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必欲去之而后快。在《金棺》里，戴克里先和他的共治者在对基督教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马克西米安父子和伽列里乌斯可以说是顽固的反对派，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一贯赤裸裸地仇视基督徒，把基督教视为他们要夺取紫袍的最大障碍，因此无时无刻不在敦促戴克里先下令迫害基督徒，伽列里乌斯甚至不惜采取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段，把他企图暗害戴克里先的罪行也加在无辜的基督徒身上。戴克里先也是反对基督教的，就是他亲自下达迫害基督徒的敕令，但是作者在叙述他对待基督教的态度上并不陷入简单化，而是多方面地展示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与矛盾，因而有助于揭示戴克里先最终失败的内外原因和产生悲剧的必然性。按照罗马多神教的教义，皇帝是主神意志的体现者，所以戴克里先是作为众神之父的儿子受到崇敬的。他根据大神母的启示夺得紫袍，又照大神母的口谕精心谋划让儿子继承

皇位。因此，他对众神是无限忠诚与依赖的，在作出任何重大决策之前总是先让祭师们用占卜术征询众神的意向。不过，当他听到基督徒医生治愈因精神受刺激长期卧床不起的妻子的病时，一度产生过接纳基督徒的神加入众神之列的想法；他还因为亲身受到基督徒的诚挚的欢迎而对他们产生好感。这样，他对皇后和康斯坦丁父子劝说宽容基督徒的话多少能听得进去，在具体措施方面有过某种妥协或者宽容，甚至打算让儿子在登基之日同基督徒实现和解。不过，他的忍让又是有限度的，一切都以不妨碍他恪守的“神谕”得以实现为前提。例如，数学家比雍在答应严守“神谕”秘密时才得免于一死，并被迫离开宫廷；曾为他献出自己一只眼睛，又把他儿子抚养成人的昆图斯，就因为弟弟是基督徒，戴克里先怀疑他会泄露“神谕”而暗中派人把他杀害；尤其是他听信伽列里乌斯的谗言，说基督徒扬言要灭绝他的后嗣，感到“神谕”可能流产时，终于下决心对基督徒大开杀戒。如果说戴克里先跟伽列里乌斯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更老谋深算和冷酷无情。在对待基督教的问题上，康斯坦丁父子则是持不同于戴克里先、更是有别于伽列里乌斯的态度，他们（特别是君士坦丁）清楚地看出受到贫民和奴隶广泛拥护和崇信的基督教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他们能俯顺民情，在这场斗争中借用这股力量击败对手，得以在戴克里先逊位后统一罗马帝国，同时也为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铺平了道路。

四

《金棺》的另一个重要的中心内容是昆狄波同提坦妮拉的爱情及其悲剧。象所有思想纯洁的普通青年男女一样，他们彼此

真诚地相爱着，但是在那个等级森然、贵贱有别的社会里，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因而最后终于演出一场悲剧。提坦妮拉从小没有母亲，在祖母的关怀和溺爱中长大，后来又随父在军营里生活，养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被称为野性的诺比里西玛，但她心地善良，身为皇室成员，但没有太多的贵族小姐的派头和傲气；相反，却能体恤下人，这反映了她头脑里的平等友爱思想。昆狄波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就是戴克里先的独生子。他是以园丁昆图斯的儿子，也就是以奴隶身份被召进宫为皇帝服务的；虽然在跟比雍学习几年后，学问大有长进，又被任命为皇帝身边的记事官，但毕竟还是奴隶。低贱的出身使他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在奉命侍候皇后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基督教的圣经，很自然地受到基督教平等、博爱思想的熏陶。昆狄波发现提坦妮拉待自己很真诚，逐渐对她产生了朦胧的爱情，然而内心里沉重的自卑感又使他不敢存有非份之想和作出主动的表示。提坦妮拉则不然，她爱上仪表堂堂、勤奋好学的昆狄波，大胆向他表露自己真挚而热烈的感情，对昆狄波说，“除了你，我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人……今后也不会再去爱任何人。”昆狄波也向她表示，对她的爱至死不渝。应当说，正是平等、友爱的思想促使他们相爱。一旦纯真的心扉被打开，爱情之火点燃了，蕴藏在这对青年男女心田里的共同思想情感就如汹涌奔腾的波涛，冲破横亘在他们中间的障碍，使他们沉醉在短暂而幸福的热恋之中。

遗憾的是，命运对这对情侣却是十分苛求的。即使是在巴依埃那样令人神往的爱情生活里，在快活的时刻，他们还是感到他们头上悬着一把利剑，时时刻刻要把他们分开。当时，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而且都带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出于政治上的需

要，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分别招各自的副手做女婿和养子，于是，康士坦提乌斯只好同第一个妻子赫莲娜分手，娶马克西米安之女提奥多拉为第二个妻子。戴克里先的女儿瓦列里娅也不得不同身上散发着血腥味的伽列里乌斯一起生活。因此，不但只知道自己是奴隶出身的昆狄波明白要想跟被奉为神一般的皇室成员诺比里西玛结合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情，即便是敢于打破某些清规戒律的提坦妮拉，最终也拗不过父命。提坦妮拉同马克森提乌斯的婚姻完全是出于伽列里乌斯同马克西米安父子结成联盟、阴谋夺权的政治需要。戴克里先对儿子的婚事也有所安排，企图通过儿子同波斯公主联姻建立起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国家——罗马、波斯大帝国。正是在这种人们正常的思想情感受到蔑视，政治考虑成为婚姻的首要前提的道德原则和社会环境里，《金棺》的作者深刻地揭示出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而戴克里先那道维护古罗马神圣道德、纯洁家庭生活、婚姻关系不能更改的敕令，最终使这对恋人仅有的一丝幻想很快成为泡影。如同提坦妮拉对昆狄波说的那样，他们都“必须顺从连皇上也无法把你从中解放出来的可怕的法律”，提坦妮拉因此不得不跟她所厌恶的马克森提乌斯结婚而最后要了她的命，同时也断送了昆狄波的性命。

如果说昆狄波和提坦妮拉意识到在信奉多神教的古罗马社会里他们的爱情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梦幻时，他们倒是在基督教宣扬的平等、博爱和牺牲精神的主张里获得精神支柱和道德上的力量，并找到了最后的归宿。在基督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冲破罗马多神教和奴隶社会的种种不合理束缚，象普通人一样无拘无束地真诚相爱，在美丽的大自然怀抱里，犹如一切上帝的创造物一般，自由而充分地享受着爱情的甜蜜。

但是，昆狄波和提坦妮拉的爱情却没有象君士坦丁同小保姆的爱情那样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的欢乐是短暂的，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他们只能相约以死来表明心迹和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抗争。值得一提的是，戴克里先顽固地维护罗马多神教、无情地迫害基督教的行动既是昆狄波和提坦妮拉爱情悲剧的直接原因，同时也使他自己的计划遭到破灭；尽管戴克里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他是作为旧制度的殉葬者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与此同时，昆狄波和提坦妮拉的死却显示出基督教必定要替代罗马多神教、新事物注定要取代旧事物的历史规律，因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和精神力量，后者表面上虽然强大，却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和绝大多数人们的意愿，因此注定要走向灭亡。在这一点上，昆狄波和提坦妮拉的爱情悲剧突破了个人的小圈子，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五

在艺术描写上，《金棺》的主要特点是：在尊重历史基本事实的前提下，运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大胆地塑造人物形象，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合情合理地展开故事情节的叙述，既注重保持历史环境的特点和气氛，又通过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描写注入浓厚的生活气息，使读者获得了历史的艺术真实感。

首先，在生活场景的安排和描写方面，为了更好地衬托出古罗马帝国这一庞然大物的历史事实，作者有意把故事内容分别放在好几个地方铺开叙述，从安条克、尼科米底亚、亚历山大里亚、巴依埃、罗马到萨罗那的欧亚非三大洲，在空间上给读者留下一个十分辽阔的印象，而政治斗争和爱情生活的具体描写又始

终紧密地同它们联结在一起，使全书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其次，在每一个地方又都突出一个中心内容，或者叙述重大政治活动和最高决策，或者描写基督教的传播和惨遭迫害，或者讴歌纯真的爱情，或者展现流血斗争，最后交代命运的安排等，虽头绪纷繁，却井然有序，构成一幅错综复杂而又缤纷多姿的社会生活场景。再就是通过一些表面上看来是细微的描写，如戴克里先寝宫失火，行举手礼，称呼休世太保等，显然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三十年代初德国纳粹上台前后的某些情景；作为历史小说，作者巧妙地运用历史事实，经过艺术加工，表达自己的意图，让读者在思想上产生共鸣，这也是《金棺》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之处。

《金棺》的艺术特点还表现在塑造出一些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不论是戴克里先和他的共治者们，或者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作者都不是照搬历史或是干巴巴的叙述，而是通过丰富的生活细节的描写，刻画出他们各自的个性特征，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在最上层的统治者中间，戴克里先是个中心人物，作者从交代他上台的经过，到他为了防范共治者而采取的措施，即所谓独生儿子落水死去等别出心裁的安排，以及对基督徒的迫害和消灭可能会妨碍他儿子继承皇位的潜在因素等，充分揭示出他的工于心计、忘恩负义和阴险毒辣；另一方面，作者又较细致地描写了戴克里先复杂的内心活动，即作为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或者说夫妻、父子之间的思想感情，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更为真实。面对妻子的悲伤和儿子对自己敬而远之的神情，他经受着内心的巨大痛苦与折磨；为了保证“神谕”的兑现，他不得不在妻子面前守口如瓶，把昆狄波当奴隶对待，但在暗中他又多么希望享受

普通人的天伦之乐！最后，他终于打破坚持多年的缄默，在哀伤过度的妻子面前吐露了真情。他的失言绝非一时之冲动，恰好说明他的人性并未泯灭，普通人的思想感情占了上风，因为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刻画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格并揭示出他的悲剧的内在因素。另外，书中伽列里乌斯的形象也是写得较为鲜明的。他膂力过人，性情暴戾，嗜血出名，复仇心切，时刻在觊觎皇帝宝座，从而暗中使出种种手段。他平日虽然很少过问女儿的生活，却是深爱女儿的，当得知女儿病死时，立刻失声痛哭，流露出真挚的父女之情。在他借口为女儿举行葬宴，演出一幕逼宫之戏中，又表现出他粗中有细、机智过人之处。康士坦提乌斯在统治者中间表现得较为大度豁达，深得人心，也颇受戴克里先的信任和倚重，是以正面人物出现的，但是，他的形象显然比伽列里乌斯的形象苍白一些。

在年轻人物的描写方面，作者着墨最多的是昆狄波和提坦妮拉。昆狄波的性格特征是由于他的双重身份所决定的。作为戴克里先的独生子，他暗地里受到保护和得到悉心教育，成长为一位勤奋好学、品德兼优的青年；但他又是始终以奴隶身份出现的，所以总感到自己比别人低一头，在思想感情上同皇帝和皇后存在着很大距离，对他们更多的是敬畏而毫无亲近感；自卑感使他处处小心谨慎，既不象马克森提乌斯那样骄横放纵，胡作非为，也缺少君士坦丁那种无忧无虑和敢作敢为的气质，即便是在热恋阶段，也总是保持着清醒的理智，为不幸的阴影所烦恼。提坦妮拉天真烂漫，有着一颗少女的善心和追求真正爱情的强烈愿望，但作为诺比里西玛，在婚姻问题上又不敢违抗父命，所以尽管她对父亲说“与其让马克森提乌斯拥抱我，我宁愿让你把我掐死”，但最后还是“用两只手捂着自己的胸口”顺从了父命。当